

目 录
CONTENTS

编者按：诚信2.0撞击中国社会。时常听人感叹，当今社会，诚信不彰。这只是社会现实的一方面，即诚信1.0体系逐渐瓦解；事实上，还有另一方面，即诚信2.0体系正在快速构建。

所谓诚信1.0，是指传统的以道德号召、舆论谴责为主维系社会诚信的模式。诚信2.0与此有根本不同：道德号召、舆论谴责虽然仍在发挥作用，但已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方式，诚信更多依靠一套更规范、更严密的制度体系——社会诚信体系来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诚信建设一直在以加速度奔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2014年，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

去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公布，提出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机制，将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洪宛介绍，发改委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统一了社会信用代码；二是建立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是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为社会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询；四是建立了重点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

下一步怎么干？我国将加快推动信用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条例、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研究起草工作，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个层面的信用信息共享，把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有关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信息系统打通，化解信息孤岛难题。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诚信模式处于从1.0向2.0的快速转型中。这一转型将怎样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推出“诚信2.0”专题，供您决策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诚信2.0

- 02 守好你的诚信，它很值钱
- 03 诚信转型，社会大考
- 05 迈向诚信2.0，尚需跨过三道坎
- 07 迎接“信用画像”新时代

政坛经纬

- 09 奥巴马卸任前给特朗普的神秘信件

经济纵横

- 10 中国各省都有哪些经典经济病

人物春秋

- 13 胡耀邦为何不读《资治通鉴》

文化漫步

- 17 党政机关文化设施对外开放利于文化普及

历史深处

- 18 如果英法搞不绥靖 能击败德国吗

悦读时光

- 封三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十二）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守好你的诚信，它很值钱



落户不看学历看诚信、免押金租物住宿、纯信用免抵押贷款……曾经看不见、摸不着的诚信，正逐步“变现”，成为“有形资产”。

“老赖”赖不掉

“是登封市法院吗？我是被你们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李某某。我马上还钱，你们赶快把我的手机彩铃取消吧，太丢人了！”当了多年“老赖”的李某某主动给河南省登封市法院打电话，表示愿意履约。

李某某口中的彩铃，是登封市法院专门为“老赖”定制的“老赖彩铃”。拨通电话，数声警笛后，便是“你拨打的机主已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当亲朋好友、生意伙伴给“老赖”拨打手机时，听到这样的彩铃会作何感想？

“老赖彩铃”是河南法院破解“执行难”系列“组合拳”之一。“老赖”不仅被禁止乘坐飞机高铁、购买不动产、旅游度假等消费，还在公务员招录、入党、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受到限制。

“压缩老赖生存空间，让其无处躲藏”，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江西建立“法媒银”平台，在全国首创法院、新闻媒体、银行金融机构联合惩戒“老赖”模式。该省各基层法院会在第一时间将“老赖”信息上传到“法媒银”平台。

在“法媒银”首页，近两万条“老赖”信息不断滚动播出，精确到姓名、照片、住址和身份证号。“法媒

银”平台与最高法失信惩戒系统、江西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实时向执行联动单位推送“老赖”信息，在融资授信、行业准入等多方面加以限制，最大限度压缩“老赖”生存空间。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共有681万人次通过“法媒银”平台查询失信名单。在曝光的3.4万名典型“老赖”中，有6324人履行了义务，标的额达5.06亿元。

诚信正在“变现”

今年7月，深圳正式实施《深圳市积分入户办法（试行）》，放开落户的学历限制，以居住、就业和诚实守信为指标进行积分。不少人感叹，落户深圳不看学历看诚信，诚信正在“变现”。

事实上，不仅仅是落户，当“老赖”日子越来越难过时，守信者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变现”鼓励。

8月6日，在郑州上大学的赵丹像往常一样骑着一辆ofo共享单车逛街购物。一天下来，除了购物看电影，累了就在购物中心按摩椅上按摩15分钟，吃饭用大众点评搜美食，她一天的消费都用手机支付宝“蚂蚁花呗”付款。

“支付宝根据信用记录确定个人芝麻信用分数，我的芝麻信用分是708，信用等级是极好，能享受2500元的蚂蚁花呗额度，可以先消费后还款。”赵丹说。

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芝麻信用与ofo共享单车公司合作，芝麻信用分在650及以上的用户，可享受免押金骑行服务。不仅是共享单车，如今酒店住宿、租车租物等领域都已推出凭信用减免押金服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住酒店可免交押金，并用信用额度付款，基本是直接拎包入住、离店交钥匙走人。其间没现金往来，全凭信用，方便快捷。

在江西省新余市，干部选拔任用，首先要过“诚信关”。新余市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信用档案，将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聘任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下转第三页）

诚信转型，社会大考

不可否认，传统的诚信体系正在失灵：小到考试舞弊、乘车逃票，大到恶意欠薪、电信诈骗，这些失信违法事件年年喊打却屡禁不止。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也不是。本质上，诚信建设需要转型，这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场大考。

传统模式失灵

在地铁的出站口，经常能见到有乘客双手撑在闸口两旁一跃而过，还有乘客紧跟他人身后冲过闸口。他们当中有穿着时尚的小伙，有花枝招展的年轻女性，也有年过半百的大妈。过闸后，他们大多满脸堆笑，丝毫不顾他人不屑的眼神和谴责。

同样是逃票行为，在普通火车或高铁上也屡见不鲜。南昌铁路局一名工作 10 余年的乘务员说，她

(上接第二页)

截至目前，新余市共收录 708 家机关事业单位、27953 名公职人员相关信息，累计收集机关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在履职、奖励处分、违反各项规定等方面的数据 7 万余条，另有交警系统对接相关数据 300 余万条。今年以来，新余已为各部门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推荐学科带头人等工作，提供了 300 余名干部的信用等级报告。

“信用经济”爆发

信用骑车、信用住店、信用医疗……“无现金社会”的背后，不仅是人们支付方式的改变，更是每一笔支付累积的信用。诚信体系的建立正推动社会综合治理的发展，也在点燃“信用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引擎。

如今，诚信不仅是个人财富，也是企业资产，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资产。我国多地正尝试以企业纳税诚信为重要参考，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在深圳，创业创新金融服务平台依托企业信用信息，

经常在车上碰到不买票乘车的旅客，为了逃票在整列火车里窜来窜去，甚至有旅客看见检票员来了就躲进卫生间，直至火车到站。

坐车逃票，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让人窥见社会诚信的大问题：考试作弊，学历造假，论文抄袭；恶意欠债，有钱不还；食品以次充好，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传销屡禁不止，不少人把黑手伸向自己的亲友；伪造档案谋取升迁，有人除了性别，其他信息全是假的……

人们对此早已深恶痛绝。然而，传统的以道德号召、舆论谴责为主维系诚信的模式正在失灵。“这样做，我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邻居要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对许多人来说，类似的顾虑越来越少。因为如果谁也不认识，单纯的舆论谴责，杀伤

将企业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对接，减少信息不对称，将企业诚信资产“变现”，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一些互联网公司更是凭借大数据优势，综合运用贸易、征信、社交、工商、税务等数据，开展企业信用评价，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80 后青年景毅是河南商水县一家小型纺织厂的老板。今年 3 月，主做外贸出口的景毅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开设网店。凭借良好的信用记录，他从平台的银牌客户升级为金牌客户，可享受 100 多万元的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贷款服务。

除贷款授信外，景毅还享受阿里巴巴一达通的快速退税服务，往常 3 个月才能完成的出口退税，由平台垫资 3 天内就能先行支付给他，最终退税款直接由平台代扣。

“信用等级提升了，才能获得更高的融资额度。”景毅说，目前他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经营自己的网店，努力提升信用等级。

(半月谈记者 孙清清 陈毓珊 周科)

力是微乎其微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交往半径扩大，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已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许多人甚至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失信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毫无疑问，现代社会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维系诚信的体系。

新经济的呼唤

在美国、瑞士等地交流访学时，小宋印象最深的是国外完善的法治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到自己回国创业后，小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信用体系完善的社会里，可以给人以更高的可预期性，交易风险随之降低，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在沟通和协调上。

小宋说，创业后经常会遇到尾款拖欠的问题。一年前，一位刚打交道不久的客户信誓旦旦地说要偿还十几万尾款，结果至今未还。“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更有耍赖不还的。”小宋说，“一个欠款链条断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上下游企业陷入停滞。”

新经济更需要诚信护航。比如共享单车，自投放以来时常遭遇“不测”。有的被涂去二维码，有的被搬回家中据为己有。就在不久前，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盗窃共享单车的案件。这样的案件如果频繁发生，共享单车的前景必然会蒙上阴影。

如今互联网经济中，不少类似的新业态都面临着诚信的考验。

互联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平台经济。通过网络平台，它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连接起来，打破时空界限，减少中间环节，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是，信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一个陌生人，我该不该把住房短期共享给他？网上招聘信息，我要怎样判断是不是真的？

这正是诚信 2.0 要解决的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淑钿指出，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以制度化诚信体系为保障的信用社会，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经济社会就不能健康发展。

转型正在提速

目前，从 1.0 到 2.0 的诚信转型正在提速，虽然失信的问题依然严峻，但诚信的制度之网正在加快编织，诚信的奖惩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正在展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2014 年，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洪宛介绍，发改委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统一了社会信用代码；二是建立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是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为社会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询；四是建立了重点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

陈洪宛说，下一步我国还将加快推动信用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条例、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研究起草工作，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个层面的信用信息共享，把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有关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信息系统打通，化解信息孤岛难题。

陆杰华也表示，要进一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

（半月谈记者 周科 陈毓珊 陈晓波）

迈向诚信 2.0, 尚需跨过三道坎



一位女士正在查询自己的信用档案 梁强 摄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2.0 版本的社会诚信体系正在向我们招手。但是,招手不等于握手。要真正迈向诚信 2.0, 至少还需迈过三道坎。

打破“信息孤岛”,建设信用信息大平台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一大前提就是信用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使用。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信息慢、缺、散,各个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是我国迈向诚信 2.0 需要跨过的第一道坎。

“一些地方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各类信用信息的归集还不够及时。”江西省新余市文明办副主任孙时勇说,有的单位在上报监管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过程中,存在主动性不强、上报数据不及时,甚至漏报、瞒报等情况。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启动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形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法人、自然人“五位一体”的信用大数据平台,建立了横向到底、纵向到底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

非易事。”温州市信用信息中心主任金宗来说,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在系统设计之初出于保密考虑,只给市一级开放了数据录入权,未给予其数据导出权。信用大数据平台需要使用这些数据,就要跟省级有关部门联系。“很多省厅部门最开始出于数据保密考虑并不愿意提供数据,都是反复‘磨’下来的。”

在浙江台州,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从最初的服务金融机构为主,逐渐拓展至信保、税务、外贸等各领域,功能也从原先的信息查询为主,增设了信用评分、诊断预警等。

台州市长张兵说,打破信息孤岛,推进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首先要统一各部门的思想认识。信息共享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大局所需。政府部门都是公共财政供养的,各部门在工作中产生的信息,毫无疑问属于政府,而不能为部门所独有。其次,打破信息孤岛,关键是要让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跑起来、转起来,发挥作用,只有如此才能持续。

破解“九龙治水”,强化部门协同意识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信用信息整合不到位,背后的根源就在于部门割裂。虽然不少地方建立了多部门合作机制,但实际发挥作用有限。部门割裂、各搞一摊,协同意识不强,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又一道“坎”。

山东一家商业银行负责人说,严惩失信才能让诚信发光,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得到严惩。“根源就在于部门协调不到位,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治到位。”

该负责人说,碰到一些贷款不还的“老赖”,银行

只能到法院起诉,就算法院判决了,执行也很难。“你想限制老赖坐飞机,还得看民航等部门愿意不愿意办。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说起来容易,一到落实执行层面,需要不同部门配合才能完成,而现在恰恰在部门配合层面有问题。”

“有的部门依然延续过去单打独斗的监管思路,比如在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双告知’后,后续监管部门不及时认领企业及跟踪监管,日常检查数据不及时反馈系统等等,这就影响了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协同推进。”江西省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徐云辉说。

金宗来认为,联合奖惩是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务院为此已出台了指导意见,一些部委之间也签订了备忘录,但在具体实行中,各部门对于如何开展联合奖惩仍存迷茫,一方面在法律上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案例指导,目前做得较多的是对守信联合激励。

山东省发改委是山东省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具体工作由财政金融处兼职负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该项工作的负责人表示,各有关部门都很支持信用建设工作,但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独立的行业信用体系,行业内部信用信息如何综合、汇集是一大问题。

该负责人说,不少部门限于人员紧张、信息化程度低等现实,其自身行业内部的信用信息整合仍未实现。另外,信用工作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不到位也是一大制约。作为全省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财金处人员、精力、经费都很有限,而各市发改委基本没有专门的内设机构和专职人员。

建设“诚信政府”,加强示范引领

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缺一不可。“在所有的诚信当中,政府诚信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先导和表率。”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马广海说,当前政府诚信建设任重道远。“迈向诚信 2.0,还要迈过政府诚信这道坎。”

一段时间以来,“一任领导一套规划”成为部分

地方的官场潜规则。新官上任三把火,往往暗含对前任部分决策的扭转甚至否定。加之政务活动中存有缺乏实效的措施、说了不做的表态、伪造指标的成绩、隐瞒实情的通报等,长期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

马广海说,政府带头讲诚信,就能发挥正面示范作用,引领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如果政府带头不讲诚信,将导致社会个体间、市场主体间相互忌惮,长此以往,自然是世风日下。

去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公布,提出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机制,将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

温州市长张耕说,应从全面建立政务诚信和公务员诚信记录制度入手,加强各领域政府信用建设,广泛开展信用示范县(市、区)、示范镇(街道)、示范村创建工程,树立“信用政府”良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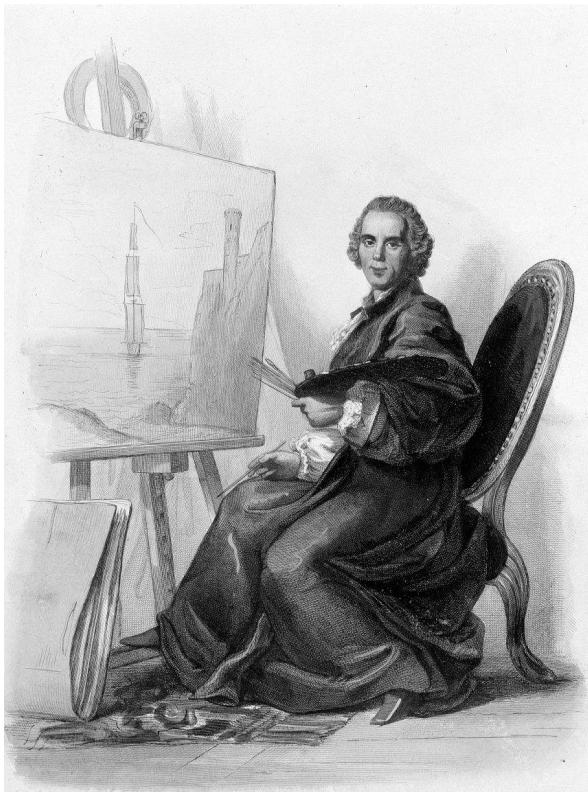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说,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引领和示范。相比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老百姓对政务诚信的要求更高。他认为,除了政府、公务员要进一步提升诚信意识,加强个人约束,做好引领示范外,政务诚信至少在两方面还有待加强。

一是政务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化。“现在政府很忙,但很多老百姓却不知道政府在忙什么。”章政说,所有的国家权力,除法律有规定的之外,都应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应尽最大可能公开信息,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

二是政府要为社会提供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章政说,政府现在掌握大量信用资源,这个资源不能仅仅搁置在一旁,而要让各个部门的信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予以公开,“这些信息对企业、居民作判断、作决策有很大帮助,要让这些信用信息为百姓服务”。

(半月谈记者 娄辰 陈毓珊 陈晓波)

迎接“信用画像”新时代



几年前，当有人问“你的信用有多高”时，你或许会苦于难以“一言道尽”和“自我证明”；而今，你会打开支付宝，向对方展示你的芝麻信用分。信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透明。

这正是科技的力量——汇聚各方信息，为个人信用“画像”，并具化为直观的数字。当信用愈发透明化、标准化后，也就有了众多应用场景。而在

此过程中，信用将成为新的流通工具，并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评价、交往体系。

科技为信用“画像”

“欠医院的 2951 元医疗费，我已经还了，麻烦尽快将我的不良记录删掉。”去年 10 月 14 日，浙江省松阳县法院执行实施科副科长洪美娣一上班就接到了“老赖”江某的电话。

洪美娣从事法院执行工作已多年，她没想到，拖欠医疗费近 13 年的江某主动还钱，原因竟是法院将“老赖”名单提供给芝麻信用后，其芝麻信用分骤降。

“我们的制度一直在打击失信行为，但为什么效果不彰？”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马广海说，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技术层面的支撑，将来要实现无信不立的理想目标，关键靠技术。

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说，芝麻信用的评分体系引入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各类消费及行为、传统金融借贷等信息，运用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通过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和人脉关系 5 个维度进行综合评测，进而对个人信用情况进行“画像”，原本抽象的信用即被量化为直观的分值。“随着数据更加丰富，‘信用画像’也将更加精准。”

“将来的某天，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系统会自动记录、汇总。”马广海说，“失



信到一定程度，早上出门，卖早点的不卖给你，得饿着肚子出门；想坐公交，对不起，不让你坐；去找工作，人家一看记录，免谈；在中国待不下去了，出国混吧，限制出境了。”

没钱可以，没信用不行

刚留学归国的张浩目前在杭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工作后，首先摆在他面前的是“住”的问题。在朋友推荐下，张浩尝试支付宝上的“租房”，很快在上面看中了一个单间。凭借 744 分的芝麻信用分，张浩此次租房免去了押金和中介费。“这样的免押金租房在国外都没体验过。”张浩说。

“这是人际往来的一次巨变。”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说，现在生活中很多都是货币往来，虽然移动支付不用现金，但如果不能完成支付，商家不会把东西给你。而在将来，人们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信用往来。“有钱没钱不重要，关键看你有没有信用。”

专家认为，未来信用或将成为新的流通工具，且与货币不同，信用能带给往来双方更高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以押金为代表的传统风险担保模式，或将被失信带来的全方位惩戒模式所代替，这将极大降低往来成本，提高往来效率。

在政务服务方面，“网上批、快递送、不见面”

这样“一次都不跑”的体验或不再遥远。在深圳，有 26 万名老人在领取养老金时，已不需再去人社大厅做验证，只要在家用手机打开支付宝，“刷一下脸，眨一眨眼”，通过新型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信用认证，就能完成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

因科技而兴，会被科技撞腰吗

尽管信用社会的美好蓝图令人憧憬，但人们总会觉得，没有哪个社会是十全十美的，总会有新的挑战出现，尤其是建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之上的信用社会，是否也埋下了隐患？

首先被提及的是大家最关心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信用画像”基于个人方方面面的信用数据，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浙江温州市信用信息中心主任金宗来认为，这首先需要从立法上对信用数据和个人隐私予以明确，从而在采集之初杜绝风险。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建议，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不断拓宽拓深，有必要制定法律法规，对数据采集、深度学习等予以规范和引导，此外还要大力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

其次，当移动支付、信用消费等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时，包括老人在内不善于使用新技术的人群，是否会被排挤在外？专家指出，信用社会要实现普惠，既要帮助部分弱势群体适应新技术、新环境，又要尊重、保障多元选择的权利，防止“市场霸权”情况发生。

最后，伴随信用建设兴起的新经济，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胡滔说，推广新的信用应用场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要共同建立提前商讨机制，做好应对，减少隐患。

(半月谈记者 陈晓波 周科 闫祥岭)

奥巴马卸任前给特朗普的神秘信件

今年1月20日奥巴马度过了自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晚。在他离开之前，有媒体拍到他把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对于信的内容当时众说纷纭。如今CNN公布了最终答案，奥巴马按照传统，以卸任总统的身份在信中给出了自己对继任者的四点建议。

奥巴马祝贺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提醒他“将承载数亿人的期望”。“这是个特殊的办公室（白宫椭圆办公室），没有获得成功的清晰蓝图，因此我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是否有效，但，还是让我回顾一下过去八年的工作。”以下是奥巴马留给特朗普的四点建议。



特朗普（左）与奥巴马（图：法新社）

构建更多成功之梯

人各有命，富贵在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的责任是竭尽所能创造更多的成功之梯，为了每一个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和人民。”奥巴马写道。

维持国际秩序

美国的财富与安全依赖于维持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

的，因此美国总统需要通过“行动和表率”来维持美国对世界的引领。

让民主工具和建立时一样强大

奥巴马提醒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就代表了成为保护宪法责任的护卫者。“我们只是这个办公室暂时的拥有者，无论日常的国内政治纷争如何激烈，我们的责任是让前辈留下的民主工具与建立时相比一样强大。包括法律规则、三权分立、人人平等和民权自由。”

给朋友和家庭留点时间

在首个任期来到第三年的时候，奥巴马曾告诉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自己的工作离不开妻子米歇尔的帮助，第一夫人帮助他能够冷静面对各种压力。奥巴马提醒特朗普家庭是关键。“无论有多忙，花点时间给家庭和朋友，他们会帮你度过各种难以避免的困境和难关。”

2009年，奥巴马收到了小布什的“建议信”，小布什写道，“你总有需要尝试的时候，批评会席卷而来，你的盟友也会让你失望，但是，你会有万能的上帝来安慰你，一个爱你的家庭，一个支持你前进的国家，还有我。”

2001年，卸任总统克林顿对小布什的“提醒”则是总统工作乐观的一面。“你现在肩负的重担是巨大的，但这常常被夸大了，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所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相对而言，再往前八年，老布什给克林顿留下的建议要简单得多。“你的成功现在是国家的成功，我会为你加油，祝你好运。”

（2017年09月04日 第一财经）

中国各省都有哪些经典经济病

常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让许多传统经济理论失效的地方。

华盛顿共识——推崇资本市场自由化、国有经济私有化的转型理论，在实践中输给了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

奥肯定律——每当GDP增速比潜在增速高2%，失业率将下降1%，在中国并不符合。

基尼系数——0.4是国际警戒线，中国官方数据0.465，民间调查结果更高，但也没见多么激烈的社会矛盾。

洲/国	名义GDP(十亿美元)	年份
亚洲	27,222	2016
北美	21,260	2016
欧洲	19,070	2016
美国	18,562	2016
中国	11,392	2016
南美	3,940	2016
非洲	2,190	2016
大洋洲	1,468	2016

资料图

为什么会出现种种“失效”？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太大了。她的人口、面积，以及近年的经济总量，都是大洲级别的，因此许多适用于国家的经济理论，对她而言尺度不对。

那些传统的经济理论、现象、指标，更适合用来观察省份。

此前曾发文，将中国各省按人均GDP分为五个梯队，对应世界不同级别的经济体。今天我们再来讲讲，中国各省的经济问题，又对应着世界哪些国家的典型症状？

山西省：荷兰病

荷兰病，约等于“资源诅咒”，是指一国经济由于



资料图

某种自然资源丰富，出口收入极高，劳动力和资本随之转移，导致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衰落的现象。

贸易条件一旦恶化，当地经济便会放缓甚至停滞。荷兰的天然气、OPEC的石油，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山西。虽然东北也有石油、煤炭、钢铁城市，但因之建成了重工业集群。而山西，煤炭、炼焦在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

2012年，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山西省煤炭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万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山西GDP的31%，煤炭工业对山西经济贡献率为56.6%。

在煤炭供不应求的时代，“一煤独大”的山西，人均GDP曾比旁边的陕西省高近四分之一。

而如今，全国煤炭产能过剩十几亿吨，七大煤企几乎全部亏损，国家不许山西再上马新的煤炭项目。山西省的经济增速，也转眼间落入全国倒数。

辽宁省：铁锈地带

如何振兴老工业区，其实是世界范围的难题，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意大利的西北三角地带、美国的五大湖区，都是转型艰难。虽然出现过短暂的

复兴,但完全无法比拟昔日的辉煌,这些地区被称为“锈带”。

中国的锈带,集中在东北,尤其是辽宁。



2017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倒数第一、三、四位。

东北的“斑斑锈迹”是体制问题吗?恐怕不全是。不然世界范围内不会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不然大搞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就解决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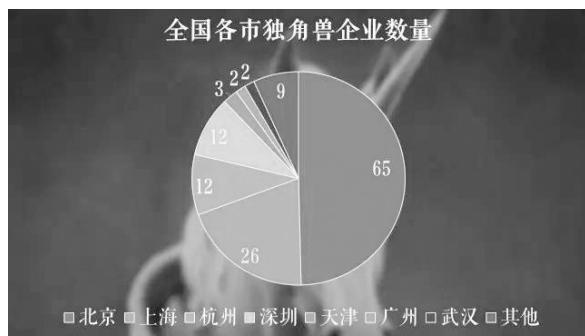
东北的问题,重点在于支柱产业落后,在走下坡路,换谁走都是下坡路。布局新兴产业才是王道——例如同为老工业基地的重庆,如今制造业重心放在笔记本电脑、汽车等领域,成了中国经济增速数一数二的地方。

北京市:“巨兽”东京都

北京的经济发展有什么问题?

答曰:北京的问题不在于自身,而在于资源太过集中,掩盖了整个北方的光芒。

在全球找一个类似的一级行政区,就是东京都了,这里占据日本GDP总量的六成,坐拥39家世界500强总部,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巨兽”。



资料图

北京没有那么高的GDP占比,却拥有更多的500强总部——56家,世界第一。之前频道还曾列举过,整个北方的独角兽公司几乎全部汇聚北京,不在北京的四家也是北京企业的分公司。

这是问题吗?乍一听没什么不好。

然而,曾有学者测算,如果上海某行业发展比全国平均快1%,则会带动江苏、浙江、安徽同行业发展比全国快0.15%左右。而北京之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这个相关性是反的。

也就是说,北京不想要的产业,周边才会发展;北京想要的产业,周边会因它而衰退……如何将吸附作用转变为辐射、带动,是北京需要面对的问题。

上海市:少子化的东亚国家

上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问题?犹记得一位研究区域经济的朋友曾对小巴说:长三角经济圈,已经好到他给不出建议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隐忧,就是少子化问题。2015年初,上海卫计委官员就曾呼吁大家生育二胎。人口结构失衡,可比上面那些问题可怕多了。如的中国还可以通过人口跨区域流动来填上海的缺口,将来呢?不断延迟退休年龄?

国家或地区	生育率	排名(共224位)
中国大陆	1.55	184
日本	1.39	208
韩国	1.24	219
香港	1.11	221
台湾	1.11	222
中国大陆*	1.04	?
澳门	0.93	223
新加坡	0.79	224

资料图

*前一个中国大陆生育率及排名来自CIA-WorldFactbook,后一个中国大陆生育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都是邪门的生育率低下之地,日韩、新加坡、港澳台一概如此,

而且越富生得越少,怎么鼓励都没用。

上海,无非是在中国各省市中最先走到了那一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值得全国警惕。

以上问题,都没有回答如何解决,不是小巴只拆台不搭台,而是解决方案需要群策群力,非我一两句话能够答出。

该怎么对新经济进行“聪明的监管”

据央视报道,纵观近十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互联网、供应链服务等新经济企业群发展迅猛。这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

尽快把新经济纳入市场监管范畴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经济发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过去几年,依托于巨大的市场,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三新”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电商等某些领域的新经济也引发了各方对垄断的争议,虚拟货币等某些领域新业态风险防范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聪明的监管,实现创新驱动、公平竞争、风险防范的均衡。

首先应尽快把新经济纳入市场监管的范畴中,深入研究新经济的监督内容。

新经济发展中的聪明监管,一方面对新经济、新事物要有一定的耐心。新经济发展有很多新的情况是以前没有遇见的。传统的监管理论、监管工具能不能适应新经济,需要有一个观察和判断的过程。

以电商为例,2016年有一家电商企业在B2B领域市场规模占比为43%,第二名仅为7.5%。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垄断。原因在于当前评定垄断的标准,主要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即市场占有率。

然而,新经济大都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业态,BAT等都有对中小企业开放的平台,是一种产业生态,初创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孵化、发展。这不同于传统的有明确边界的企业,市场份额是不是界定新经济垄断的有效指标,如何判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需要尽快把新经济纳入到监管范畴

中。新经济的发展,有新的特征,但不意味着可以游离于市场监管之外,脱离监管的视角,否则容易出现某些风险。

比如,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初期,监管滞后,导致了不少P2P平台出现问题,一定程度地冲击了金融安全。因此,对新经济,既要监管,又不能匆忙下垄断的结论。

加快适应新经济特征的市场监管

其次,尽快建立适应新经济特征的市场监管,做到“会监管、能监管”。客观看,我国当前的监管体制,还主要是适应于传统的工业化阶段,面对新经济、新业态的新特征,原有的市场监管思路、监管工具难以适用,“不会监管、不能监管”的矛盾突出。

比如,目前,大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如何界定大数据的产权,如何保障大数据的安全,成为市场监管的重点,但这方面还没有完全破题。再比如,现在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里没有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行业,这就造成了营业执照办理时登记困难,也导致“三新”统计与监管面临挑战。

因此,适应新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建立新的市场监管体系。比如,探索政府与平台相互协调的监管体系,赋予平台相应的监管权限,构建“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监管企业”的格局。这一点,在电商领域尤其重要。否则平台治理假货会面临诸多挑战。再比如,适应“大智云移物”的趋势,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聪明的监管,要做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

最后,把数据安全问题作为聪明监管的重点。新经济以数据为动力,没有数据就谈不上新经济。但目前在数据监管的体制上,还有很多挑战。

比如,数据分散的问题、数据安全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乱象。比如,消费者的个人数据在市场上被销售牟利。聪明的监管,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数据安全,既保障国家层面的数据安全,也保障企业和个体的数据安全。

(新京报 2017.09.11 匡贤明)

胡耀邦为何不读《资治通鉴》

核心提示: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



胡耀邦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罗炤,原题: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

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奥斯陆大学讲学,当时有数十位挪威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听课,无法回国向胡伯伯的遗体告别。这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国讲学,不能恭趋墓前祭拜。现在,谨将绵绵的追思写成此文,向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治学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遥献一瓣心香。

胡伯伯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刚进学

校时,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苦恼。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震动。上高中时,我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感到困惑、迷惘。对照雷锋的事迹,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选集》教导我: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我认定,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现在回想起来,36年前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我与胡德平是同班同学,平时很谈得来。1963年5月,我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快写,我们一起下乡去。于是,我给胡耀邦伯伯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这时,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

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陆平校长专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他要我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我们和他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被打倒的胡伯伯说对毛主席“我要愚忠”；对理想、学说、事业仍然执着

5年以后，我第二次见到胡伯伯。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开始我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他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很长时间了。

胡伯伯关切地问我北大情况。这时我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我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伯伯，我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了。我要愚忠！”

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我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

度外了。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那时，我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以及林彪的“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对毛主席却仍然由衷地崇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当时的心境，正和李白这两句诗描述的一样。与胡伯伯的这次见面，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他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我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我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伯伯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我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我在心中把他当作我的精神导师。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

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

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

胡伯伯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

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对我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得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伯伯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我明白他讲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

些话在胡伯伯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我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27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伯伯亲自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便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思想与活动。

对于他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伯伯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

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敬爱的胡伯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我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确确实实是他的人生写照！

胡伯伯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

月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我已经调回家乡安徽省金寨县）。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对我粗浅的第一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此时写出正式的论文，我首先寄给他请求批评。

12月8日，胡伯伯给我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鼓励我，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我认为，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因为这是他在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仅三个月、“两个凡是”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发展的脉络。

1989年以后，我的注意力渐渐地回到现实问题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开始认识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问题。随着认识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启蒙老师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来也存在着封建传统的影响，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坚决地一步一步摆脱，直到彻底决裂！

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我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不是胡伯伯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我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伯伯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想，识者能够明白他当时语境中蕴含的确切意义。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抛开个人因素的顾忌，敬谨发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写给我的信。我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党政机关文化设施对外开放 利于文化普及

9月7日，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将鼓励和引导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内部文化设施向公共免费或优惠开放；支持民办机构兴办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事业。（9月10日《新京报》）

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内部文化体育设施，如果只是一家单位独享的天地，一方面会造成文化设施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公共文化的普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红利。

为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需要一些有着得天独厚文化设施资源优势的单位开门迎客。无论是面向公众的免费服务，还是采取优惠收费方式开放，只要公众乐于接受，就应该积极推进。以高校为例，文化体育设施开放不但可以提高公共资源利用率，而且也有助于宣扬大学文化。

自然，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内部文化设施对外开放，会给自身的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安全、卫生等，也必然增加相应的管理成本。以免费开放为例，或由此引发的“公地悲剧”，一是不能小觑，二是不得不防。因此，内部文化设施共享，需

要相应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手段跟进，否则就有可能诱发问题滋生。

同时，文化设施共享，共建是前提。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密度，北京市的意见就提出一个量化标准：“以15分钟为服务半径，规划基层文化设施布局，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并且提出，要确保公共文化设施、全民健身设施与新建、改扩建住宅小区建设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及时交付使用。这就为公众共享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

再者，对于公众而言，踏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享受文化体育设施，不仅要善于维护设施的良好运行，更应注重文明言行，保持好这些单位的正常工作和管理秩序。否则，当初设想的“互赢”之举，就会因此沦为“互伤”之境。实际上，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唯有人人多些文明之举，多些守规矩意识，才能既使自己受益，又不损伤公共环境。

总而言之，文化设施共享助推文化效能提升。一方面这些单位敢于并乐于开放内部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各方共同努力确保共享单位的正常工作和管理秩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参与到共享之列。同样，最大限度地新建和统筹开发各类文化资源，才能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红利。

（南方都市报 2017.09.11）

如果英法搞不绥靖 能击败德国吗

一直以来德意志第三帝国都是欧洲人民心中永远的痛，尤其是对于英法这种原本的列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它们彻底丧失了以往的霸权，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尤其是英国在改型成了社民主义国家之后，其国际声望更是跌到了谷底，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才恢复部分元气。不过，不少人认为它们是纯粹的活该，在小胡子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的。那么如果英法真的出来阻止这一切，能否阻挡得住小胡子的野心呢？

英法能否干预

要明确这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希特勒是什么时候开始“越轨”的。

要知道希特勒可不是什么僭主，而是民选上台的，他的意志其实代表了德国大众。而德国人之所以这么支持他，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屈辱。德国损失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不说，还丢了本土的13%。事实上扣除希特勒统治时期，一直到东西德合并为止，德国就没真正统一过。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到了的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而希特勒在吞并波兰之前，其实所作所为都是德国人自19世纪开始一直想要做的。按理来说，其干的最为过火的事情无疑就是吞并奥地利了。但是要知道德国和奥地利的前身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将其是奥地利德裔而被戏称为“奥谍”。结果就是希特勒原本打算在入侵奥地利后，把奥地利作为傀儡国家的，但是因为收到奥地利人的欢迎实在出乎预料，让他改变了主意变成了德奥合并。

因此英法其实缺乏足够的干涉理由。而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重要目的就是因为那里有着充沛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矿物资源，并且由于说着同一种语言，整合这些资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就导致德国的综合国力在吞并奥地利之后飞速进步。



希特勒在奥地利受到的欢迎超出了预计

在此之后，英法能够成功干预的可能性就要低很多了。

事实上英法也知道这些，而在当时民主制度还处于初建阶段，希特勒充分利用了民粹，使得一切看起来符合程序正义，也让英法没了大局干涉的理由。

同时英法也有自己的困难。以英国为例，就算是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根据估计德国只需要十五个满编的师登陆海峡对面，英国就面临失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狮计划这么振奋人心的缘故，因为它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法国更为悲惨，虽然还维持着“欧陆第一”的表象，但是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损失其实更为惨重，巴黎号称“三分之一的男人拄着拐杖，三分之一带着假面”，同时由于大量数学家的战死，法国科研力量也衰退了，此时欧洲的科研中心已经是德国了。

而从希特勒的表现看，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其实都是德国严格意义上的潜在兵源了。以悲剧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早在1933年就日耳曼人组建了苏台德德国人党，并且一直接受纳粹每月15000马克的秘密援助。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党派就获得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支持。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公投了，和如今的克里米亚一样，属于压倒性胜

利。除此之外在，丹麦、在荷兰都有大批或公开或潜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从事后统计伤亡也能看出，仅仅是东线，苏联



张伯伦签署慕尼黑条约之后的回国演讲

人就干掉了一千多万德军，但是整个德国二战中的死亡人数只有九百多万，这是算上西线的和死于轰炸的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我们不能推测出整个欧洲有多少他国国民加入德军。我们很难说一旦开战，已经力量大减的法国和陆军弱小的英国能否打赢欧陆日耳曼人的联合进攻。

事实上懂得欧洲古代、近代历史的人不难看出，很大程度上，二战时期盟军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德国了，它是历史上神圣罗马的最终形态，没有诸侯统一完整的日耳曼人国度。

强大的外援

以为英法仅仅是面对仅仅是第三帝国？那就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除了同族兄弟之外，德国还有个铁杆的盟友——苏联。众所周知，苏联人二战前和德国人关系非常好。

如果说英法面对纳粹的步步紧逼是选择妥协，希望希特勒能够满足的话，那么斯大林就是这个过程中铁杆的盟友。每时每刻都有来自苏联的石油和粮食被运往德国，稍有军事常识的都知道这属于战略物资，可以说二战前期，苏联就是纳粹的盟友。

苏联人还为德军封禁了自己的艺术家。众所周知在一战的时候，德国人曾经逼迫列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走了大片土地不说，还拿走了

大量赔款，事后更是悍然毁约入侵。因此戏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在1939年他将著名作家卡达耶夫的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改编成歌剧《谢苗·科特科》。作品描写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青年英雄谢苗·科特科的战斗事迹，剧中的德国侵略军全都是令人发指的屠夫。结果闯了大祸，斯大林得知这出剧的内容后，认为如此描绘德国人是“不能容忍的”。每次排演都派官员来“指导”，官员逼着艺术家



二战前期希特勒和斯大林是真正的盟友

们修改。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示：只要把德国人改成白匪军不就可以了吗？最后将剧中德军通通改成国籍不明的入侵者。

除了《谢苗·科特科》之外，还有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女武神》，讲述打击德国侵略者而被打入冷宫，甚至是作者兼记者的爱伦堡描述法国人在德国铁骑下受苦的《巴黎的沦陷》都没有通过，因为编辑提出条件：书稿中凡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字眼得删去，凡遇到“打倒法西斯分子！”的口号要改成“打倒反动分子！”，等等。爱伦堡不同意，同他们争执了好久。

当然苏联这一切也不是白做的。德国人在期间积极为苏日双方调停。众所周知在沙俄时代，这两国就因为东北的利益掐个不停，虽然诺门坎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但是苏联人的战损比并不好看。因此，哪怕是二战最危急的时刻，苏联人也在远东维持着巨大的兵力防备着日军。不过有了德国这个“润滑剂”之后，双方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一直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苏联人才悍然撕毁条约，收割战争果实。



祖国对法西斯如此谄媚估计把这个正直的记者气得半死

而从德军对苏联的入侵看来，希特勒的准备非常不充分，甚至可以说基本功都没有做好，更像是一拍脑袋去干的。首先就是物资问题，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德军之所以败得那么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俄罗斯的寒冬。但是了解欧洲的人都知道，其实德国的气候比之苏联并不见得更加温暖。说白了，德国的失败就是根本没有准备冬季作战，情报上又有着严重的不足，甚至连苏联铁轨是宽轨都不知道，导致德军无法及时获得补给，最后迎来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说明，希特勒并没有充足的准备计划。这时候的他，更像是一个不想在通过贸易手段获得苏联战略物资的强盗，而且是临时起意的。而促使这一行为的原因是，苏联在之前的苏芬战争中糟糕的表现，90万苏军打人口几百万的芬兰都打的这么辛苦，可不就是希特勒口中“一踢就倒的房子”？

不过根据后来的研究，希特勒在二战前期过于顺利的表现也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帮助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自己却和苏联干了起来

号称欧陆第一的法国仅仅六周就跪了，还有什么能挡住小胡子？而如果英法一开始就没有妥协绥靖，而是拒绝签署《慕尼黑协议》和德国开战。虽然可以肯定无法击败“完全体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不至于败得如此惨，小胡子也就不会后来这么狂妄。而法国如果能顶住，苏联人就依旧是德国的铁杆盟友，双方甚至可以像会师波兰那样组成联军和盟军磕。事实上，9月17日苏联决定出兵波兰的那天，还有30万左右的波兰军队依旧在和德军作战，得知了腹背受敌的情况后，华沙政府才决定流亡海外的。



谁想到瓜分波兰后苏德友谊的小船几年内就翻了

结语

现在我们能得出结论了，答案是不能。

虽然英法在纸面数据上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小胡子背地里养兵已经不是秘密了。法国虽然强大，但是一战的伤口它其实比德国更重，而英军在非战时只有数十万的常备陆军，说实话连配角都勉强。

而德国背后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此时的德国经过民族主义的武装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状态，没有之一。此外，苏联人的帮助，付出一定代价后，东欧的战略资源也可以为希特勒所用，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像会师波兰那样在事实上达成同盟。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上帝的骰子确实着迷，如果没有那么容易法国的沦陷，希特勒就不会那么不膨胀，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去打苏联，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从这方面来说，法国人六个礼拜被德国打趴，也算是对二战反法西斯同盟诸国的一种别样贡献吧。

(2017-09-10 凤凰历史 伊斯培德尔)